



“理论之后”中国文论的境遇与知识学反思

姜文振

内容提要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文论的发展显现出一种从现代知识型向后现代知识型转换的理论趋势。这一知识型转换发生于“理论之后”的特定知识生产境遇之中。“后理论”时代的到来，成为我们对于中国文学理论知识生产进行深刻的批判性反思的重要契机。在基于知识学反思的理论探讨中，人们试图重新确立文学理论的知识学定位，辨析“理论”终结的可能与意义，探寻超越“理论”危机的新路径，寻求由此形成中国文论的原创机制，并适时使中国文论走向世界。这一主导思路引领当代中国文论知识生产因应文学与文化生态的整体变化而趋向于多元共生状态；以此为境遇和理论前提，以“综合创新”为指向的文学理论体系建构日渐成为学界共识。

关键词 理论之后；中国文论；境遇；知识学反思；综合创新

—

进入 21 世纪，反思百余年来中国文论的知识生产成为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论域。在知识社会学视域内，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乃至自然科学是人们在各学科领域知识生产过程中所进行的一种系统性的知识建构。这一建构过程并非一种纯粹的逻辑推演，亦非相关领域人类活动实践经验的一种完全的归纳与抽象，而是在社会生活各层面、意识形态各领域以及各种学科知识的复杂关系中完成或展开的。“知识型”的概念即生成于知识社会学关于知识生产与知识体系建构的反思性理论探讨。

作为生成知识的平台和根基，知识型是一个时代所有知识形式之建构共同遵从的“语法”系统，它呈现为一种话语（知识）关联总体，与在现实中相互关联的知识、科学、理论的话语体系之建构同步生成随其整体关系的变化而发生转换。“文学理论知识型”属于“知识型”话语分析框架下的一个下位概念，它从属于特定时空中的“知识型”，并在文学理论的学科空间中呈现着“知识型”的构成原则对于“文学理论知识”的塑形，它在现实中相互关联的知识、科学、理论的话语体系之建构的基础上生成并随着现实中多层次社

会关系的变革而发生范式转移。

“知识型”的概念和知识学的相关理论为我们审视和反思百余年来中国文论的发展演进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从知识学层面来看，20 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理论知识型正是在中国社会文化的现代发展、中国社会文化“知识型”的现代性建构之探求中生成的，由此实现了从“古代文论知识型”向“现代文论知识型”的历史性转换。基于现代文论知识型的文论研究是中国现代性构建中的一种重要的知识分子话语，它肯定文学的价值，扬弃古代文论、诗学的话语方式并将来自域外的文论资源中国化（本土化），追求文论话语体系自身的科学化、系统化，强调对于文学的本质规律的把握和对文学真理的追求，力图建立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总体性、一元化的理论格局。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具有后现代特质的消费文化的兴起和思想文化上“后学”话语影响的日渐深入，中国现代文论知识型及其知识生产遭遇了诸多的质疑和反思。进入 21 世纪以来，在更加深入的反思性理论与知识氛围中，中国文论的发展显现出一种从现代知识型向后现代知识型转换的理论趋势。以“反本质主义文论范式”为标志的文学理论研究的越界、扩容、转向的态势渐趋鲜明，“文化研究”逐渐成为新世纪文论研



究的重要一翼。

实际上，这一知识型转换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已经在“后学”的促动之下逐渐展开。中国文论界对“后学”的了解是从“后现代主义小说”等文体形式的革新与创造开始的。以杰姆逊1985年在北京大学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系列讲演及这个讲演的中文版的出版^[1]为开端，“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开始越来越深入地为中国学界所接触并了解。至90年代，杰姆逊、利奥塔、拉克、德里达、福柯、哈贝马斯、罗兰·巴特、特里·伊格尔顿、伊哈布·哈桑、克里斯蒂娃、赛义德、霍米·巴巴、希利斯·米勒等人的代表性著作陆续译入中国，“后学”由此为学界广泛关注并在最先接触、了解、接受这些“新”理论的学者那里成为研究热潮^[2]。被文论界称为“理论”的各个研究领域体现出越出文学研究的领地走向“文化研究”的共同理论取向，为置身于时代变化与大众文化急剧膨胀、传统文学研究日趋边缘化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的中国文论研究提供了走向“文化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与方法论支持，为世纪之交的中国文论走向走向“理论”埋下了伏笔。

但是，我们需要看到的是，中国文论界开始越界、扩容、转向，走向“文化研究”与“理论”之际，恰是西方的“文化研究”“理论”研究开始趋于“终结”并出现“后理论”转向之时。正如人们所熟知的，20世纪的西方“文学理论”研究可以分为上下两段：前半段（19世纪末至20世纪60年代）西方文论实现了理论研究的“向内转”，转向文学的“内部研究”，强调文学研究清晰的文本对象，力图清晰厘定文学的性质、内容和边界，以此为根基建立作为独立学科的文学理论，以清除各种“外部研究”所带来的各种理论“谬误”，形成了西方现代文论研究的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等几个形式主义派别，将基于现代结构语言学的形式主义文论推演到了极致。

正所谓“物极必反”，当形式主义文论发展至其极致状态时，文学研究的内部分化也就发生了。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文学理论”研究进入其理论发展演进的“下半段”，“在经过七八十年‘与世隔绝’的状态以后，文学理论又折返回

来，朝着社会、历史、现实‘向外转’了”^[3]从形式主义所关注的形式本体、语言、文本结构重新转向文学文本之外，社会政治、历史与文学的关系以新的问题提出方式被重新关注，性别、族裔、亚文化、消费文化等“边缘”领域逐渐成为理论研究的重要对象，文学研究也由是走向“文化研究”，形成了新的“理论”潮流。

因此，20世纪西方文论的演进是一个由“外”向“内”，再向新的“外”连续转向的过程，这一新的向“外”转使得西方文论形成了一个“理论”的时代，即如伊格尔顿所描述的：“文化理论确实是非同凡响的15年——大约从1965年至1980年的产物。”^[4]在伊格尔顿看来，“这正是一个消费社会蓬勃发展，传媒、大众文化、亚文化、青年崇拜作为社会理想出现，必须认真对待的时代，而且还是一个社会各等级制度，传统的道德观念正在受到嘲讽攻击的时代。社会的整个感受力已经经历了一次周期性的改变”^[5]。在这一转向中，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形成了一种极为重要的理论交互：文化研究者从文学之“外”（政治、历史、族裔、性别、身体、权力等）进入文学，又以“文学研究”的方法研究文学之外的各种文化现象（政治、历史、族裔、性别、身体、权力等），从而使得其研究不再封闭于文学自身，文学创作、文本结构、陌生化的语言、文本读解等等都不再是作为“专业”或“学科”的文学研究重点关注的对象，文学作为一种活动被视为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与社会实践。乔纳森·卡勒对此有明确的描述：“1960年以来所发生的事实：从事文学研究的人已经开始研究文学研究领域以外的著作。……这种意义上的理论已经不是一套为文学研究而设的方法，而是一系列没有界限的、评说天下万物的各种著作。从哲学殿堂里学术性最强的问题到人们以不断变化的方法评说和思考的身体问题，无所不容。”^[6]在几乎无边界的“理论”热潮中，传统意义上的“纯粹”文学研究退居到了学术的边缘地带。从事“理论”研究的人们往往急于去追踪各种过去并不为人们所关注的文化现象，恰如伊格尔顿所言：“文化理论的作用就是提醒传统的左派曾经藐视的东西：艺术、愉



悦、性别、权力、性欲、语言、疯狂、欲望、灵性、家庭、躯体、生态系统、无意识、种族、生活方式、霸权。无论如何估量，这都是人类生存很大的一部分。要想忽略这些，目光得相当的短浅。”^[7]为避免“目光短浅”之嫌，“理论”研究者们将人类文化拆解成了零打碎敲的各种碎片，然后把这些细小的碎片放到“理论”的显微镜下做精细的微观研究。它以后现代主义的思维方法和阐述方式，告别了现代主义关于真理、理性、本质、科学等“宏大叙事”的普遍言说，进入了各种可能的“小理论”的微观理论探索。

但是，对于中国学界而言，这种“理论”的热潮似乎有点来去匆匆——我们刚刚开始试图沿着西方文化研究的途径去开辟文学研究的新路，西方“理论”的黄昏已经降临，“后理论”作为一种新的理论浪潮再次涌入中国学界。

二

如果说文化研究意味着中国文论知识型开始呈现出从现代向后现代转换的趋势，那么“后理论”是在催促着我们再次寻求知识型的转换吗？从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与体系构建的角度看，这种可能性尚不存在。21世纪初文论知识型的“后学”转换并非中国文论知识生产的一种整体性转向，它所形成的是基于现代性知识型与后现代知识型的“多元”理论状况。这种多元理论状况之形成，既源于几乎是叠加在一起引进中国的西方“理论”及“后理论”的影响，更源于中国文论知识生产的自身逻辑即建构“中国”文学理论体系的理论构想。

西方“理论”走向“终结”，进而开始所谓“后理论转向”，其表面原因在于曾经引领“理论”热潮的那一代大师级的人物开始纷纷退出历史舞台，没有出现更多的可以超越“理论”大师的新的理论成果；其内在原因则在于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了解了文化研究的路数，发现其“三板斧”用完之后，除了性别、族裔、权力、亚文化等等之外，好像已经难以再提出更新鲜、有趣、颠覆人们常识的新问题，“理论曾让许多人激动不已，现在它越来越令人感到乏味，因为它已变成可以预测的东

西”^[8]——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没有更新的问题提出来，意味着理论的停滞，意味着必须有新的研究领域和新的研究方法的运用来改变这种停滞的局面。于是，当“理论”大师们纷纷退场^[9]，“理论”风光不再、“轰动效应”日趋消逝时，“理论终结”之声便甚嚣尘上。乔纳森·卡勒、拉曼·塞尔登、布鲁姆、伊瑟尔等一批著名理论家都将这个问题作为重要论题进行研究讨论，各种宣称“理论”终结、“后理论”来临的论著纷纷出版，“后理论”成为“理论终结”“历史终结”“文学已死”“理论已死”“人之死”等“集体死亡”声浪中的一个众声喧哗之地。

但是，“理论终结”并不意味着“理论已死”，或一个“后理论”的新的“黄金时代”已经来临——“理论”的发展仍然充满着不确定性，即使在伊格尔顿那里也是如此，《理论之后》是作为理论的实践者和捍卫者的伊格尔顿，与作为理论的良好和谴责者的伊格尔顿之间的对话，抑或，人们可能会说是坦率正直的戏剧演员特里和外行的说教者特里之间的对话^[10]。要对“后理论”作出全面的评价还为时尚早，因为“‘后理论’是一种尚未定型的学术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此前‘理论’的延续”^[11]。相对于“理论”，“‘后理论’更重视行动、实践，更讲究实用性、应用性”^[12]。

从这一意义上说，“理论终结”只是一种幻象，它所终结的并不是理论自身，而是其曾经的表现形式、概念体系以及关注对象等方面。尽管伊格尔顿提出“文学理论要重新回归文学本体，要在道德和伦理等宏大问题上进行建构性的反思”^[13]，他仍清楚地认识到：“如果理论意味着对我们指导性假设进行一番顺理成章的思索，那么它还是一如既往地不可或缺。不过我们正生活在所谓高雅理论的影响下，生活在一个因阿尔都塞、巴特和德里达这些思想家的洞察力而变得更为丰富、进而也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他们的时代。”^[14]这就意味着，“理论”虽有终结态势，但并不会死亡，也没有可能通过“死亡”或“终结”重返“前理论的天真时代”^[15]，人们通过“理论”已经清楚地理解和醒悟“解释艺术作品只有一种正确方法这种想法是错误的”，“除作者之外还有很多因素参与艺术



品的创作”，其中“最有争议的当属文化与权力的关系”^[16]。也就是说，即使对“理论”的“琐碎”与“纠缠”心生各种不满，人们也不会再以某种单一而纯粹的方式去看待“文学”，也不再会以一种“纯审美”的方式去定义文学。

“理论之后”“理论终结”“理论死亡”之类判断的提出，或者“后理论”时代的到来，在中国文论界引发了诸多关注和讨论。“新世纪以来，后理论研究迅速成为国内学界新的学术增长点……《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哲学研究》《文艺理论研究》《外国文学评论》《学术月刊》等国内权威期刊都陆续刊发相关文章，其中《文学评论》《文艺研究》近十年内连续发表十多篇相关文章，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国内许多有影响力的理论研究者，如王宁、周宪、陈晓明、王岳川、姚文放、王一川、阎嘉、周启超、金惠敏等都加入讨论。”^[17]人们有的从中国学界的本土化立场给出明确的回应，有的则以一种超越国界和民族的普遍性理论立场进行讨论。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们认识到，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其实不必再循着西方的“理论”研究的路子继续走下去了，应当基于中国社会文化与文学发展的当代现实做出一种“以我为主”的主动选择。

如果立足于中国社会语境与文化生态来探讨“理论之后”文学理论的未来走向问题，则需要对学界曾经的“理论热”进行深刻的理论反思，并在反思中适时调整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方向，重新确立中国文论知识体系构建的原则、路径和理论支点。短暂的“理论热”虽然有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的兴起和文学艺术的生态变化的现实基础，但多向叠加的西方文论/文化研究的“理论”及“后理论”话语的引进、译介和运用显然是更为直接的理论动因。百余年来中国文论的知识型转换和范式转移许多时候与西方学术的影响直接相关，20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的文论“转型”更是如此。学界对于西方文论的译介引进一方面表现了我们对于理论和方法创新的渴望与追寻，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引进和运用源自西方的各种“理论”时的简单机械和理论失据——这也正是近年来强制阐释与公共阐释文论范式致力于理论反

思与重建的一个基本动因。如何对待西方文论，如何形成中国文学理论的“中国特色”，展示“中国精神”与“中国气度”，从而在世界文化交流与文学理论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成为许多学者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

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日趋深入，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与西方不是彼此外在的，而是相互关联的。我们引进西方文论以推动中国文论的现代发展时，很多时候并未确立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的合理关系，人们往往将西方文论对中国文论的影响视作是一种“刺激—反应”的关系。在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中，人们往往预设了中国文论/西方文论或中国文论/世界文论的二元对立。因而，有学者强调，我们应当超越“世界与中国”（World and China）这样一种潜在的二元对立话语模式，尝试从“世界中的中国”（China in the World）的视域来观照中国文论的知识生产，重新思考中国文论知识生产与世界理论生产之间的交互关系，从而在一种“文明互鉴”、中西互为对象化的理解中探寻中国文论的建构发展之路，从“体”/“用”、“西化”/“化西”的纠葛中解脱出来，在世界思想文化体系的视野中重新观照中国文论的知识生产，形成学术探讨和理论知识建构的更为平和的心态，以更为开阔包容的理论视野来看待西方文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以“世界理论中的中国文论”作为我们检视与反思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与探索的基础^[18]。

尽管如此，我们仍毋庸讳言在学习借鉴西方文论时所表现出的诸种理论偏失。从文论研究的现状来看，那种承续着传统学术的“疏证”传统、满足于解读各种中外文论“经典”的读解式、诠释式文论研究仍不少见。人们以“学术”之名将大量的理论研究精力置于对某个西方理论家的理论观点的释读之中，却常常未能就此提出理论新见。这与中国当下的学术评价机制有关，亦与学界存在的功利性“创新”心态有关——从既有的西方文论、文学研究成果中“发现”尚未被中国学界开垦的“新田地”并对之进行译介读解也被视为一种“创新”。



中国文论百余年来就是在这样不断的“发现西方”的过程中形成其理论研究生态的。20世纪二三十年“革命文学”理论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机械搬用，50年代对于前苏联文学理论的机械搬用，80年代以来对于西方现代主义的引介借用，90年代以来对于后现代主义及文化研究的借鉴使用，以及新世纪以来“后理论”给我们提供的“新视域”，都多少带有某种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理论倾向，而这也几乎是百余年来中国文论知识生产过程中的一种理论常态。诸多问题的存在表明，尽管中国文论百余年来在现代性的道路上奔趋，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转向文化研究，21世纪以来又遭遇了“后理论”的理论冲击，但从根本上而言，我们一直都在引进、输入、吸收、借鉴，需要站在他人的肩膀上获取理论果实、开发理论新路，并没有多少真正属于中国的“原创”的基础理论和方法论。

基于这样的判断，对于“理论之后”中国文论的境遇及可能趋向的全面考察、检视和知识学反思在中国学界逐渐展开。人们在以“反思”为主导的理论探讨中试图厘清文学理论的知识学属性，重新确立文学理论的知识学定位^[19]，辨析“理论”终结的可能与意义，探寻超越“理论”危机的新路径，形成中国文论的原创机制并适时使中国文论走向世界。例如，周启超强调，“后理论”以“后”为词语前缀，并不单纯意味着对于理论的“批判、否定、区隔”，其根本在于对“理论”的“反思、承续、超越”；面对当下的“后理论”状况，“文论园地耕耘者”应当把“反思理论”作为自己的“一份志业”^[20]。赖大仁指出：“‘后理论’转向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反理论’，……不是要消解和抛弃理论，而是注重批判性地反思理论。”^[21]王宁也认为：“‘后理论’是一种思想状况，是对理论的一种反思和重识，同时也是对理论之未来发展的一种憧憬和展望。”^[22]在这样的“后理论”时代，虽然“理论”的盛期不再，但死亡的并不是理论本身，而是曾经参与到文学、文化中的“理论”的形式。在文学、文化研究的不同领域中，理论研究依然葆有其鲜活的生命力，在文学研究中不断提供新的致思方向，在诸如后人文主义、性别理论、地缘政治、生态批评和动物研究等文化现象中也依然保

持着其特有的批判精神和对自身的反思。

显而易见，“后理论”时代的到来，成为我们对中国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进行深刻的批判性反思的重要契机。人们逐渐明确，伊格尔顿所谓的“理论的终结”并不是传统文学理论的死亡，而是以“后现代主义”为理论根基的“文化理论”趋于式微。理论本身不会终结，因为文学理论研究在对日常生活实践和文学实践日益密切的关注中不断反思固有的“常识”和概念体系，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和实践的理论形态，在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发展成为多种话语共存的知识形态。

因此，无论在走出“理论”之后如何发展，文学理论终究都不会真正消亡，它仍然会以各种形式或状态持续发展——或继续走跨学科的文化研究之路，或使理论研究回归文学、重返文本分析，或进一步发挥理论的现实介入特质而深化理论的政治化，或重建文学研究的疆域而致力于学术本位的全面复归——文学理论研究目的不仅仅在理论自身，其知识生产与社会文化和文学的发展现实同频共振，这是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个基本要求。

四

我们应该秉持怎样的理论立场和价值判断来建构文化世界和精神世界，进而确立面向现实与未来的中国文论知识生产的“应然”路径，已经成为我们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一问题产生之关键在于中国文学及中国文论在中国现代文化秩序重建中的特殊意义和地位。中国现代文论知识型的生成及以此为基础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并非以寻求建立独立的学科发展机制、进行纯粹的文学理论学术研究为唯一鹄的。近代以来关于文学的特征、本质、规律、功能等诸多问题的探索研究，首先着眼于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与中国社会文化秩序的重建。清末民初的审美文论与功利文论的并立，五四时期启蒙文论对于改造“国民性”的强调，革命文学理论对于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推进，20世纪80年代以来审美文论的理论探寻，都体现着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在现实的社会文化秩序重建中所发挥的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某些历史阶段这种作



用甚至是决定性的。当然，也正因如此，在中国文论知识型从古代到现代，又在新的世纪显现出从现代向后现代转型的理论趋势时，各种政治、道德、权力、制度、市场、金钱、民族、传统、哲学、美学乃至文化心理、日常生活的因素所形成的结构复杂的话语关联，使得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节奏常常步履匆匆，难以形成得到广泛认可的具有原创性的文论知识体系。

当然，在“后理论”的理论状况之下，文学理论研究依然需要考量它在社会文化秩序构建中的位置、作用与意义，依然需要在与政治、权力、市场等话语或因素的关联中进一步强化理论的自我反思。“理论”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大写的”理论也将不复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后理论”就一定比“前”理论或“理论”更为进步或更为合理，“后理论”时代既不可能完全抛弃也不可能完全重返现代性的理性、概念和逻辑。20世纪的文学理论已经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文论研究之延续需要调整自身以适应21世纪社会生活现实丰富复杂的结构、无限延展的时间及无限广阔的空间，总是有无数可供文学理论去探索研究的可能性。

在“后理论”时代，文学理论的差异化、多元化和跨学科化使它形成了一种综合的、整体的、复杂的理论话语形态，在被学界日趋关注的“后人类”语境中更趋向于多元复杂的言说方式，走向更为广义、复杂的文化理论，这种“理论”发展的可能性实际上表明“理论之后”的文学理论研究将更强调对多种理论形态的多元包容，它不是真正的终结，而是“再生”——具有“再生”特质的“后理论”时代的文学理论摒弃了传统文学理论那种“宏大叙事”的言说方式，也应同时超越“理论”自身的琐屑和碎片化，因应文学与文化生态的整体变化而趋向于多元共生状态。正是以此为理论境遇和前提，以“综合创新”为指向的文论理论体系建构逐渐成为学界共识。

面对当代多元、复杂的理论状况，众多稳健的前辈学者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从多个角度提出了“综合创新”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路径与方法^[23]。例如，钱中文和童庆炳先生总结归纳90年代文学理论多元探索的理论态势，提出协调“文学

创作与理论的关系”，“建立一种多元化的新的文学理论”，即“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所谓“中国特色”，“就是用中国人自己的目光、观点与理解”，接续一直被忽视、中断的古代文学理论系统，“与当代的中外文学实践相结合”，破除对于精神现象的“大一统”“单一化”的理解，形成“理论观念的多元化”“研究方法的多样化”的理论格局^[24]。谭好哲认为，中国当代文论建设取得很大成绩，但“文论话语体系建构尚未完成”，“以当代中国的文艺实践经验为立足点，以中华美学精神、文艺规律传承和发扬为精神资源和民族特色，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与方法为指导，真正创造出既具有民族继承性、时代原创性又具有专业系统性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体系，是面向未来的中国文论应有的抱负与追求。”^[25]高建平认为，文学理论的建设与发展，应“重视理论与文学实践的结合”，包括“理论与创作”“理论与批评”“美学研究与文论研究”等多方面的结合，“通过这种结合，形成文论研究的深度发展，从而推动文学艺术的繁荣，提高全民族的审美水平”^[26]。总的看来，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综合创新”，强调立足于“中国文论”的理论立场，在全球化和全球文化交流与文化产品流通、中国当代文化/文学的多元发展、文化研究日渐繁荣的历史语境中，广泛展开中外文论之间、传统文论与现代文论及各种“后学”之间、文论研究与其他不同学科之间、特别是文论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的深入对话，形成不同主体间真正的交往对话，努力寻找这些对话关系中的“间性”，以宏阔的理论视野打破文论研究的自我封闭，从而以中国文论具有独特主体定位的理论话语积极介入我国当代社会文化发展的“公共领域”之中，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世界文论格局中独具中国特色与原创性的中国文论话语体系。

“综合创新”的文论建构的倡导，既体现着对于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建构”特质的深刻体认，更彰显着文论研究者进行学术研究的理论担当。在经历了百余年来多轮次的文学理论研究的知识型转换与范式转移之后，人们已经超越了那种固化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单一的理论视野而趋于理论研究的开放和包容，以理解和对话的



理论姿态去面对各种不同的文学理论知识表达，寻求在“综合创新”中去实现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新的范式转移。这同时也提示我们，无论世界如何变幻，我们都应葆有一种学术研究的信念，而不应在变易的社会文化现实中目迷五色、失去文学理论研究的信心和定力。无论思维、观念、方法如何变革，文学作为一种精神生产和精神产品，它终究是诉诸人的心灵、守护人的精神家园的别样的世界。在当下这样世界多变、思想多元、价值观交错的时代，面向现实与未来的文学理论研究需要更为清醒与审慎地把握文学的“变”与“不变”，承担时代赋予的新的学术使命。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知识社会学视域下中国文论知识型的生成及转换研究”（项目编号14BZW00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 杰姆逊这个讲座的中文版《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

[2] 相关讨论可参阅高建平等《当代中国文论热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3][11][12] 姚文放：《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深层机理探究》，第1页，第55页，第5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4][5][7][14][15][16] 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正译，欣展校，第24页，第25页，第30页，第3—4页，第3页，第92—95页，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6] 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第4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8][10] 戴维·洛奇：《向这一切说再见——评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王晓群译，《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第1期。

[9] 詹姆逊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拉曼·塞尔登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特里·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等著作都对“理论”大师们的历史性退场进行了描述，将其作为“理论终结”的重要表征进行理论上的说明。

[13] 尹晶：《事件文学理论探微——“理论之后”反思文学

研究的重建》，《文艺理论研究》2017年第3期。

[17] 陈后亮：《“将理论继续下去”——近二十年来国内“后理论”研究综述》，《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18] 2018年12月10日，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举办了“中西文学理论的国际对话”学术研讨会，达成的主要共识为：中西文论和文化传统的关系不应是“刺激—反应”的模式，从“文明互鉴”的角度来看，中国文论“西化”的过程同时也正是“化西”的过程，它不应被看作“失语”；应将中国理论生产视为世界理论生产的某种内部性的甚至是源头性、显要性的存在，因此中国当代文论必须超越民族主义、地域主义、中心主义的狭隘思维。

[19] 姜文振：《“情境”与“建构”：关于文学理论知识学属性的审思》，《江西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

[20] 周启超：《在反思中深化文学理论研究——“后理论时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问题》，《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21] 赖大仁：《“后理论”转向与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学术月刊》2015年第2期。

[22] 王宁：《论“后理论”的三种形态》，《广州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

[23] 相关讨论与报道可参见金涛《文艺学六十年：从理论初探到综合创新》，《文艺报》2009年9月28日；吴子林、陈加《融合创新，走向未来——2019年度文艺学前沿问题研究报告》，《南方文坛》2020年第3期，等等。

[24] 钱中文、童庆炳：《新时期文艺学的建设与展望》，《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

[25] 谭好哲：《内容结构、建构机制与身份认同——40年来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设的反思》，《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26] 高建平：《新时期、新世纪、新时代——改革开放40年与中国文论的发展》，《文艺争鸣》2018年第12期。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责任编辑：吴子林